

# 乡关何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工 入户意愿及选择\*

郭未 鲁佳莹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中国城镇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而推动户籍改革则是其最重要的抓手。在此背景下对户籍改革政策主要对象之一的农民工入户意愿与入户选择的考量相应地成为了学界的重要关注点。立足于中山大学2014年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赫克曼选择模型的统计思路来对农民工是否愿意迁入城市户籍以及其入户城市的具体选择这两个独立而又有关连的问题进行计量分析。收入(包括个人总收入和老家有无土地分红收入)、主观不公平感的感知对农民工的迁入城市户籍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年龄、职业类型以及本地方言熟悉程度则会影响其对具体入户城市的选择。农民工入户意愿与选择并非基于简单的理性选择,其中交织着社会心理、文化等多元复杂因素,而对于上述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的探索将成为研究的又一轮热点。

关键词: 户籍制度;新型城镇化;入户选择;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668(2018)03-0035-08

## Out of Plac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and Choice to Convert to Urban Hukou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GUO Wei, LU Jia-ying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being in a phase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as its most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study on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and choice to convert to urban hukou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cus of the social policy academic community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released by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2014, this article used the Heckman selection model to analyze whether migrant workers are willing to convert to

收稿日期: 2017-09-01; 修订日期: 2017-10-11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问题研究(14CRK01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也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及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资助。

\* 作者感谢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数据用于此项研究。

作者简介: 郭未(1979—),男,四川南充人,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老年社会学、民族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社会政策评估;鲁佳莹(1994—),女,浙江绍兴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老年社会学。

urban hukou and the specific choice of their home ci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 income (including the total income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income of the hometown's land dividend yield) ,the perception of subjective injustic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move into the city; and the age ,occupation type and mastering of local dialect would affect their choice of specific home cities. This article argued that the willingness and choice to convert to urban hukou was not based on a simple rational choice ,in which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were intertwined. Howeve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these factors would become another hot issue in the future study.

**Key word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New Urbanization; Converting to Urban Hukou; Migrant Worker

## 1 引言

近年来 ,中国城镇化增长迅速 2015 年城镇化率亦然提高到了 56.1% ,并预计将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 ,然而这里面却包含着中国国内约 2.7 亿农民工在城乡及区域之间流动带来的影响<sup>[1]</sup>。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政府相应的重要政策抓手之一。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满意度 ,对此 ,掌握不同属性群体对户籍改革的真实意愿 ,评估不同主体、不同结构特点的群体对户籍改革的真实需求 ,并于此基础上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 ,才能谓之有效。

目前 ,学界对于户籍改革的重要背景 ,即包括城镇化特征、城镇化动因、城镇化发展模式、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城镇化造成的影响、国内外城镇化比较研究以及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道路等等在内的城镇化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将城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这一命题本身 ,却缺少对城镇化的真正主体——留守农村的农民及流动在城市的农民工的城镇居留意愿的现实关怀。在这场户籍改革涉及的重要群体之一的农民工的视野内 ,我们必须认识到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只有真正把握了广大农民工的城镇居留意愿 ,才能遵循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规律推进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sup>[2]</sup>。为此 ,探究不同层级农民工对于户籍改革的真实意愿究竟如何 ,抑或是探究他们的入户意愿与相继而立的入户地选择就成为了有价值的研究议题。

## 2 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的视角下 ,我们可以发现 ,近年来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了解农民工入户意愿与入户选择亦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农民工入户意愿影响因素及机制的探索方面已有诸多成熟的研究。基于中国不同地区抽样调查数据的定量研究 ,学者发现了一些共同的基本影响因素 ,比如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状况、收入水平、在城市居留时间长短、语言能力、社会融入水平等 ,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入户意愿<sup>[3-5]</sup>。而另一些研究还进一步发现了其他影响农民工入户意愿差异化的重要因素 ,就业质量维度下 ,聂伟与风笑天(2016)利用珠三角和长三角 19 个城市 1436 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较短的劳动时间、和谐劳资关系、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健全的社会保险、较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和较好的工作体验等对农民工的入户意愿发挥显著促进作用<sup>[6]</sup> ;土地维度下 ,李永友和徐楠(2015)基于浙江省富阳等地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结果间接表明家乡有土地的农民工其土地的收益会影响到他们在城市的入户意愿<sup>[7]</sup> ;进一步地 ,陈会广等(2012)将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险效应纳入经典的 Todaro 模型进行中国化改进 ,利用南京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土地保险机制的发挥影响着农民工的城乡迁移决策——资源禀赋性的土地权益在一定的家庭经营规模范围内对农民工乡—城迁移有负向影响 ,社会保障性的土地权益对农民工乡—城迁移有正向影响<sup>[8]</sup> ;职业发展维度下 ,魏万青(2015)基于刘林平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公关项目“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2010 年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仅受其职业发展现

状影响,同时也指向其未来职业发展规划,与此同时,他还发现农民工的入户诉求还受如夫妻团聚(同城工作或生活)、子女教育等家庭完整性因素的影响<sup>[9]</sup>。

此外,胡军辉(2015)特别引入相对剥夺感的概念来考察其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此情景下的相对剥夺感即是当农民工对当前能够获得或保有的价值地位(价值期待)与其认为应当获得的价值地位价值能力不一致的时候得以形成,这种情感体验对农民工入户意愿有显著影响<sup>[10-11]</sup>。相比较而言,对于农民工入户地选择意愿影响因素及机制的探索则十分欠缺。截至目前,国内只有朱健等(2017)年立足于2000-2014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作了近似探讨,他们的研究间接呈现出,农民工入户地选择维度之下,国际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沿海省份与直辖市表现出区位优势,同时这些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尤其第三产业发展对农民工在当地的市民化水平的促进作用显著;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农村劳动生产率,以及外向型经济则有利于提高中西部地区市民化水平<sup>[12]</sup>。

承接于相关文献的计量发现,本文将立足于中山大学2014年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恰当的计量模型来对农民工迁入城市户籍的意愿以及其对于入户城市的具体选择这两个独立而相继的问题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期为推动中国户籍制度的深入改革,以及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的发展呈现一篇有价值的文献,这也正是笔者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

### 3 数据与研究方法

####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中山大学2014年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以下简称为CLDS)的数据。CLDS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是一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诸多层面的大型追踪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样本覆盖了中国29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保证了样本的全国代表性。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年龄在15-64岁的全部劳动力个体,65岁以上目前有工作的家庭同住成员也同样纳入访问对象<sup>①</sup>。就本研究而言,调查问卷涉及到关于流动人口的入户意愿、就业状况、家庭情况、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有利于深入探讨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与相关情况,是一个很合适的资料。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因此设定满足流动人口<sup>②</sup>、农业户口以及学历水平在大专以下三个条件,通过筛选后,最后进入研究的样本数为1030个。

#### 3.2 统计模型

本文对农民工入户城市选择的研究是基于“农民工是否愿意迁入城市户籍”和“农民工入户城市的选择”这两个独立而相继的问题决定的,也就是说,农民工对入户城市的具体选择是在其愿意迁入城市户籍的基础上才发生的。但如果仅仅只考虑“农民工入户城市的选择”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就会舍弃掉那些不愿意迁入城市户籍的农民工信息,从而造成估计的样本并不能随机地代表潜在总体而产生选择性偏误的可能。基于此考虑,本文采用赫克曼选择模型的统计思路来避免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以确保后续的回归估计更具科学性。

赫克曼计量模型的计量表达式如下所示:

$$y_{1i} = \begin{cases} y_{1i}^* & (y_{2i}^* > 0) \\ - & (y_{2i}^* \leq 0) \end{cases} \quad (1) \quad y_{2i} = \begin{cases} 1 & (y_{2i}^* > 0) \\ 0 & (y_{2i}^* \leq 0) \end{cases} \quad (2)$$

$$y_{1i}^* = x'_{1i}\beta_1 + \varepsilon_{1i} \quad (3) \quad y_{2i}^* = x'_{2i}\beta_2 + \varepsilon_{2i} \quad (4)$$

①参见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编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调查手册》。http://css.sysu.edu.cn/Data.

②关于流动人口,《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调查手册》有明确界定:“本次CLDS的流动人口参考了人口普查的定义,户口所在地在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口都是流动人口。不过流动人口不应该包括市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所以问卷部分专门针对流动人口的问题,属于市区内人户分离的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界定有些模棱两可,在具体的问卷操作中仍是按照“户口所在地在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口都是流动人口”的要求进行。因此鉴于实际数据情况,本文按照问卷实际操作来界定。

在本研究中,  $y_{1i}$  用来测量研究对象入户城市的选择,  $y_{2i}$  则测量研究对象是否愿意迁入城市户籍。(1)式和(2)式表示为当农民工愿意迁入城市户籍时,我们可以观测到农民工对入户城市的选择,反之,则无法观测到农民工的入户城市选择。实际上在我们 1030 个样本中,只有 20.49% 的入户意愿,这就意味着在考察入户城市选择时,只有这一部分的样本进入我们的结果方程即(4)式中。在具体的模型操作中,(3)式为选择方程,(4)式为结果方程。 $x'_{2i}$  用来解释农民工是否选择加入城市户籍, $x'_{1i}$  用来解释愿意迁入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对城市的选择。当然, $x'_{2i}$  和  $x'_{1i}$  存在重合变量,甚至可能完全相等<sup>[13]</sup>。在本文中, $y_{2i} = 1$  且  $y_{1i} = 1$  表示为未删失并取得积极结果,指农民工愿意加入城市户籍并愿意加入本地(流入地)城市户籍; $y_{2i} = 1$  且  $y_{1i} = 0$  表示为未删失并取得消极结果,指的是农民工愿意加入城市户籍但不愿加入本地(流入地)城市户籍。

### 3.3 变量设置

#### 3.3.1 因变量

在赫克曼计量模型的选择方程中,因变量设置为“农民工是否愿意迁入城市户籍”。根据问卷中“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城市”的回答,将“不愿意”和“说不清”归为“无明确意愿”一类,编码为 0;“愿意”归为“有明确意愿”,编码为 1,为二分类别变量。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将“说不清”一项的处理需要谨慎对待,国外有学者对问卷中这类“不知道”、“说不清”的选项在经济学问题上进行过探讨,认为这类选项包含着重要信息,在不同情境中具有不同含义,研究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sup>[14]</sup>。在本文的问题中,笔者认为回答“说不清”的意涵更偏向于“无明确意愿”。而国内不少学者在类似迁入城市户口的回答的操作化中,也往往将“说不清”、“无所谓”等选项与“不愿意”划为一类<sup>[5-6][15-16]</sup>。在赫克曼计量模型的结果方程中,因变量设置为“农民工户口迁入城市的选择”,根据具体问卷中“如果把户口迁入城市,您最想要迁入的地点是”的回答,将“现在打工的城市”(即本地城市)编码为 1,“其他城市”编码为 0,为二分类变量。

#### 3.3.2 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结合文献综述中表达的其他学者在相似领域实证发现的情况,将模型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确定为农民工的个人基本信息、职业与收入状况、个人剥夺感以及流入地居住情况四方面。具体的变量操作化指标见表 1。

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配偶是否同住四项。其中,教育程度只考察了在大专以下的情况,将其划分为“高中及同等学力”、“初中”和“小学及以下”三种类型。配偶是否同住中分为“同住”和“不同住”两类,并将未婚者皆归入“不同住”。

职业与收入状况中,考察了职业单位类型、职业稳定性、个人年总收入以及老家分红收入。其中,职业单位类型分为“国有、集体或基层组织”、“私有、外资或社会组织”、“个体工商户”和“其他无单位”四类<sup>①</sup>。职业稳定性来源于问卷中“未来五年里,您遭遇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将“可能性非常大”、“可能性比较大”和“不知道/说不清”划为“不稳定或说不清”一类,将“可能性比较小”、“可能性非常小”划为“稳定”一类,为二分类别变量。在个人总收入中,为了控制极值,本文剔除了个人年总收入大于 10 万元的样本,整体近似正态分布。此外,老家是否有分红为二分类别变量。

个人剥夺感的考察主要是针对个人的不公平感进行处理。来源于问卷中“您认为您目前的生活水平和您在工作上的努力比起来是否公平”的回答。将其回答划分为“不公平感强”、“一般”、“不公平感弱”三类。

流入地居住状况中具体包括本地居住时间<sup>②</sup>、本地熟人或朋友数以及本地方言掌握程度。其中,前两者为连续变量。本地方言掌握程度分为“不会或会一点”、“基本会”以及“流利使用”三类型。

①其中,“国有、集体或基层组织”涵盖 CLDS2014 问卷中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国有/集体事业单位”、“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村居委会等自治组织”选项,“其他无单位”则指“务农”和“自由工作者(零散工、摊贩、自营运司机等)”。

②本地居住时间是按照问卷中对最近一次迁移时间的回答换算而成。其中,迁移是指县区或市区以上的流动,而乡镇或街道之间的流动并不归属于迁移,这一点与流动人口的界定有异。因此,仅仅只在乡镇或街道之间流动过的农民工在本地居住时间上是从出生起至 2014 年。

#### 4 计量结果分析

首先我们基于变量从描述统计维度进行初步的分析,从下述的表1我们可以看出,样本群体中仅有20.49%的农民工愿意将户口迁入城市,同时在城市的具体选择上,有63.51%的农民工考虑将户口迁入当前打工所在的城市。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赫克曼选择模型的统计思路运行计量模型,并对回归结果作进一步的分析(见后续的表2)。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030)

变量	类别/指标	百分比	样本量	性质
<b>因变量</b>				
是否愿意迁入城市 (不愿意或不清楚=0)	有明确意愿	20.49%	819	定类
	无明确意愿	79.51%	211	
户口迁入城市选择 (其他城市=0)	本地城市	63.51%	134	定类
	其他城市	36.49%	77	
<b>自变量与控制变量</b>				
性别(女=0)	男	46.89%	483	定类
	女	53.11%	547	
年龄(岁)	平均值	37.54	1028	连续
	标准差	11.90		
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0)	高中及同等学力	23.01%	237	定类
	初中	47.86%	493	
	小学及以下	29.13%	300	
配偶是否同住 (不同住=0)	同住	74.77%	717	定类
	不同住	25.23%	242	
职业单位类型 (其他无单位=0)	国有、集体或基层组织	5.40%	44	定类
	私有、外资或社会组织	54.48%	444	
	个体工商户	20.49%	167	
	其他无单位	19.63%	160	
职业稳定性 (不稳定或说不清=0)	稳定	56.80%	585	定类
	不稳定或说不清	43.20%	445	
个人年总收入(元)	均值	31184.69		连续
	标准差	21065.38		
老家是否有分红 (有分红=0)	无分红	47.38%	488	定类
	有分红	52.62%	542	
个人不公平感 (不公平感弱=0)	不公平感强	26.12%	269	定序
	一般	32.62%	336	
	不公平感弱	41.26%	425	
本地居住时间(年)	均值	17.93	1016	连续
	标准差	16.19		
本地熟人/朋友(个)	均值	6.57	1012	连续
	标准差	8.08		
本地方言 (不会或会一点=0)	流利使用	43.40%	447	定类
	基本会	23.20%	239	
	不会或会一点	33.40%	344	

注:①有些样本之和不足1030是由于剔除了缺失值或条件控制;②连续变量汇报的是均值和标准差。

影响因素——个体不公平感相结合思考。回归的结果显示,当农民工的不公平感越强时,入户意愿越强烈。也就是说,当农民工对自己努力工作的回报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感越大,其越希望加入城市户籍,此结

在本文中,赫克曼选择方程是基于“农民工是否愿意迁入城市户籍”的设置。从表2中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收入。相比于在老家有分红或其他利益分配的农民工,无分红者更愿意加入城市户籍,这一点反映出户籍制度关联着的资源分配与利益分配。不同于站在城市户籍的吸引力角度去谈入户,对农民工来说,首先考虑的是当前农业户籍下现实可得的利益,而非潜在的或说充满不确定性的城市户籍利益。蔡禾和王进(2007)指出,大多数农民工迁移者在迁入城市社区后往往也处于社会低下层<sup>[15]</sup>,因此,农民工入户并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损失最小化<sup>[16]</sup>。此外,回归的结果还反映了个人总收入对农民工的入户意愿有显著影响,当个人总收入越高时,农民工越倾向于不加入城市户籍。这一点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左,但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首先,对于高收入农民工而言,其在所属群体内(农民)处于较高的经济地位,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其次,农民工拥有较高收入,缩短了与群体外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农业户籍作为一种获得利益的阻碍制度似乎被削弱了。这两点使得高收入农民工群体的入户意愿有所削弱。而与此相反,收入越低的农民工可能有较为强烈的入户意愿。要理解这一点,可以与入户意愿的第三个

表2 农民工入户城市选择的赫克曼选择模型的参数估计

解释变量	选择方程		结果方程	
	系数	显著度	系数	显著度
性别(女=0)	-0.130 (0.111)		0.076 (0.144)	
年龄	-0.003 (0.006)		0.018 (0.008)	*
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0)				
高中及同等学力	-0.020 (0.136)		-0.008 (0.22)	
初中	-0.204 (0.168)		0.104 (0.177)	
配偶是否同住(不同住=0)	0.108 (0.131)		0.150 (0.173)	
职业单位类型(其他无单位=0)				
个体工商户	0.209 (0.181)		-0.238 (0.259)	
私有、外资或社会组织	0.275 (0.159)	+	-0.184 (0.239)	
国有、集体或基层组织	0.00174 (0.311)		7.624 (0.276)	***
职业稳定性(不稳定或说不清=0)	-0.070 (0.107)		0.116 (0.151)	
老家是否有分红(有分红=0)	0.180 (0.087)	*	—	
个人总收入(元)	-6.78e-06 (2.88E-06)	*	6.58e-06 (5.20e-06)	
个人不公平感(不公平感弱=0)				
一般	0.182 (0.104)	+	—	
不公平感强	0.313 (0.107)	**	—	
本地居住时间(年)	-0.003 (0.004)		-0.004 (0.006)	
本地熟人/朋友(个)	—		0.002 (0.009)	
本地方言(不会或会一点=0)				
基本会	—		0.198 (0.164)	
流利使用	—		0.505 (0.132)	***
常数项	-0.779 ** (0.328)		0.269 (0.396)	
rho	-11.598 (1.342)	***		
Log - Likelihood	-446.114			
model(wald) X <sup>2</sup> (d. f. = 14)	7029.84	***		
观测值	718			
删节值	562			

注: ①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② 括号内为标准误。

论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相一致<sup>[11][15]</sup>。借用社会心理学上的“基本归因错误”<sup>①</sup>可以理解,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不公平感越强、歧视感越强、心理压力越大,归结为结构性制度因素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因此,在心理上不公平感越强烈的农民工,越想要通过加入城市户籍以改变现状。同时,不公平感强烈的往往是收入偏低的农民工,他们不仅受到来自群体内部的压力,也有与打工城市居民相比的被剥夺感,这也就解释了上述个人总收入对入户意愿异于常识的情况。总之,农民工是否加入城市户籍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利益权衡的理性决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心理因素的博弈过程。

接下来,笔者进一步来分析农民工入户城市的具体选择。首先是年龄因素,在控制了其他条件后,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倾向于迁入当前务工的城市。可能的解释是,年龄越大的人越不容易适应新环境,因此在选择上更喜欢自己逐渐或已经熟悉的本地城市。此外,也可能是年龄越大的人在经历过年轻时不同城市的打工生活后,当前打工城市是在一定选择机制后他自己的较为满意的定居城市。其次,职业类型也会显著影响农民工对入户城市的选择。

根据回归结果可发现,在国有、集体或基层自治组织中

①“基本归因错误”:人们往往把他人的行为自发归因于其个人特征而非非结构性情境因素的稳定倾向。因此,相反地对于自己的结果,往往倾向于归结为结构性条件。

工作的农民工比从事农业或自由职业的无单位农民工更倾向于加入本地城市户籍。通常,国有、集体部门或基层自治组织有较为完善的保障制度,即使我们可以预见在这些部门就业的农民工也通常只位于较低层次的工作岗位,但相较于自由职业等无正式工作单位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的就业保障和稳定性更高,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加入本地城市的户籍。同时,作为城市“选”人的方式——入户政策(比如在现在诸多国内城市盛行的“积分落户”政策),对“体制内”就业的农民工往往更有利,不能不说这是有一种友好互动隐含其中。

最后,结果方程中的回归结果还显示,相比于不会使用本地方言的农民工,能流利使用本地方言者更倾向于选择加入本地城市户籍。方言是一个地区的文化载体之一,熟练使用本地方言意味着能与当地人进行良好的沟通与交往,在文化层面上存在更多情感共鸣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来说,行为观念上的“入户”远比形式上的“入户”更为重要和彻底,但这毕竟需要一个漫长的互动过程。因此,熟练使用本地方言的农民工对本地的认同感和融入感更高,选择入户本地城市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

##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使用了中山大学 CLDS2014 的调查数据来探讨了农民工的入户意愿及其对于入户城市的具体选择问题。通过研究发现,我们发现收入(包括个人总收入和老家有无分红收入)、主观意义上的不公平感感知对农民工的迁入城市户籍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在经济维度来看,较低的个人总收入、无老家分红会增强农民工在城镇入户的意愿。而这背后就涉及到农民个人利益的理性选择,只不过这种农民个人利益的理性选择并不体现在于收益最大化,而是在于损失最小化。社会心理的主观感知维度来看,农民工较强的主观意义上的不公平感感知都会增强他们在城镇入户的意愿。即是社会心理因素驱动着农民工的入户选择,他们感知到的强烈的不公平感并进而造成的相对剥夺感会促使他们在城镇之中有较强的入户意愿。

进一步,在第二个大的维度上的对具体的入户城市的选择上,年龄、职业类型以及本地方言熟悉程度有着显著影响。通过计量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年龄越大,就业于国有、集体或基层自治组织单位以及熟练掌握本地方言能显著提高他们选择本地城市的可能性。特别是,我们发现文化认同对于一个人的入户城市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之前学者们发现的“农转非”入户者的文化认同相一致<sup>[15][17-18]</sup>。当然了,笔者文章中所提到的本土方言仅是文化内容的部分维度的内容,实际上,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考方式等等都可以是涵盖于我们这里所言的城市文化体系之中的不同维度的内容。

最后,作为本文一个重要探讨议题的是关于农民工入户意愿表达之后其具体迁入地选择的考量,这借助于 CLDS2014 调查数据中的问题“如果可以把户口迁入城市,您最想要迁入地点是?”以及“如果您不想把户口迁入现在打工的城市,那最要迁入的地点是?”(其合并而出的选项为“现在打工的城市、家乡的乡镇、家乡的县城、家乡附近的中等城市、家乡的省会、外省的城市”)可以加以深化,比如,我们想要探讨出有入户意愿农民工在更广阔的入户地选择层面的作用机制,就要构建第二层的多元统计模型,但这里多元统计模型的构建必须要承载于“如果您不想把户口迁入现在打工的城市,那最想要迁入的地点是?”这个问题的样本有足够多的量,而实际上恰是在这个问题维度上的样本量不足使得我们放弃了更详细的探讨(因此笔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将其在二元基础上进行了处理,如此而行的定量研究发现只能呈现出农民工在务工城市和务工之外城市选择的机制了),以能在学者们持续关注的像是户籍限制开放背景下促进农民工中小城市社会融合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研究等更为具体的议题层面有更为重要的发现。

## 引文文献:

- [1] 郭未. 中国城镇化的“实”与“是”[DB/OL]. 光明网理论频道. [http://theory.gmw.cn/2014-06/05/content\\_11526149.htm](http://theory.gmw.cn/2014-06/05/content_11526149.htm), 2014年6月5日.
- [2] 吕鸿强,熊彩云. 中国农民城镇居住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3705个农户的调查[J]. 调研世界, 2016,(6):3-7.

